

## 明代中晚期時代巨變對陸時雍『楚辭』研究的影響\*

王孝强\*\*

### -차 례-

1. 陸時雍的生平
2. 陸時雍『楚辭』研究的時代背景
3. 時代巨變對陸時雍『楚辭』研究的影響
4. 小結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文学史书写体系的西化与化西问题研究”（19AZW015）、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陆时雍楚辞学研究”（22YJ180003）的阶段性成果。

\*\*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讲师，文学博士，

**[提要]**

陆时雍生活的明代中晚期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方面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朝廷阁臣宦官内斗，皇权对地方的控制有所松动；科举制度僵化，士人报国无门；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市井生活雅俗共赏，追求个性；思想与文艺界百家争鸣，“复古”与“浪漫”思潮相交锋。政治生态、科举制度、经济状况、社会形态、学术氛围等背景因素在陆时雍身上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对陆时雍的创作动机、屈原评价乃至研究方法、作品传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陆时雍『楚辞』研究的动机主要体现在私心爱楚、补益前贤、借以抒愤等方面。在对屈原个人品德的评价上，陆时雍更关注『楚辞』中蕴含的忠君爱国之情。在『楚辞』研究方法上，陆时雍擅长以治经方法治骚，还直接以儒家经典文本内容疏骚，力求“尽扫诸附会”，遵循“以『楚辞』还『楚辞』”的疏解思路。

**关键词：**明代中晚期,政治生态,陆时雍,『楚辞疏』,创作动机,忠君,内证

## 1. 陸時雍的生平

关于陆时雍的生卒年，学界尚未有定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陆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癸酉贡生”<sup>1)</sup>，而无具体记载。关于其生平的详细记录，当属其好友周拱辰的『陆征君仲昭先生传』，称：“仲昭髫岁颖异，试辄冠军。……与予交最善，……两家檐拱相直，书声亦略相闻。……游燕，大司马范公罔卿戴公，最相慕爱，……会罔乡以风闻有所劾，援陆为证，并逮之。繇镇抚司下刑部，卒于系。其子流离困蹶一年，仅能以丧归。”<sup>2)</sup>其『楚辞叙』又称：“吾友昭仲之才之望，所称自进于天下者也。”<sup>3)</sup>据周拱辰所述，陆时雍年少聪慧不凡，与自己比邻而居，同窗而读，相交甚厚。为此，唐世济在『楚辞疏序』中称：“孟侯（周拱辰字）丽才，少所下，独心折昭仲，兄事之，与昭仲同居语溪之渚”。<sup>4)</sup>唐世济称周拱辰“兄事”于陆时雍，周拱辰本人则称陆时雍为“吾友”，由此可推断陆、周二入年龄相仿，而以陆稍长。据周拱辰『陸陵百二岁现存胡翁传』及『圣雨斋诗文集』中『宫怨』诗下小序“时客陸陵戊寅仲秋”，可推知周拱辰当生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则陆时雍当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又，陆时雍受戴澳事牵连入狱，卒于狱所。据『明史』『国榷』二书载，“顺天府丞戴澳除名”事发生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sup>5)</sup>『光绪桐乡县志』等典籍中，在记载入清的周拱辰时，将其列入“国朝”条，陆时雍则列入“明”，且据周拱辰所说，陆时雍去世之后，“其子流离困蹶一年，仅能以丧归”，并未提及兵戈战乱之事，可推知“以丧归”时社会面依旧相对平静。所以陆时雍当逝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后，李自成攻入北京（1644）前，未

1) [清]永瑢，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4页。

2) [清]周拱辰著：『圣雨斋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401页。

3) [清]周拱辰著：『圣雨斋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4) [明]陆时雍撰；张学城、薄迎迎点校：『楚辞疏·楚辞疏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5) [明]谈迁著：『国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5865页。

入清。也就是说陆时雍生于明中期，主要活动在明晚期，没有跨代至清代。唯其如此，我们应该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明代中晚期的时代环境。

## 2. 陸時雍『楚辭』研究的時代背景

1573至1620年万历皇帝在位，在这个“漫长的怠政时代”<sup>6)</sup>，皇帝不作为，阁臣相倾轧，而这正是陆时雍从出生到而立之年成长与写作的关键时期，以政治生态、科举制度、经济状况、社会形态、学术氛围等维度为主构成的时代背景，在其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迹。

### 2.1 政治生態方面

明代是中央集权走向君主独裁的时期。明初，太祖朱元璋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提升六部权力，到了成祖时，内阁、锦衣卫与由宦官统领的“东厂”逐渐制度化，宪宗时还设立了“西厂”，至此基本完成了帝国的上层建筑，实现了君权相权合一、乾纲独断与对天下臣民的监视。这样的制度设计维护了皇权，同时要求皇帝精力充裕、勤于政务，一旦皇帝年幼或荒于政事则易于酿成宦官与阁臣之间的勾结与党派斗争<sup>7)</sup>。不幸的是，陆时雍所生活的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朝廷内部政治生态正是如此——1573至1620年万历在位，皇帝数十年不上朝，朝廷成为严嵩和张居正等人政治斗争的舞台；此后的泰昌朝，皇帝沉迷酒色，即位一月即崩逝；天启朝，皇帝不问朝政，宦官魏忠贤擅权；到了陆时雍获得贡生头衔的崇祯朝，皇帝大权独揽又刚愎自用，结果是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入京，满清入关，大明王朝走到了尽头。明末政治生态复杂，导致以陆时雍为代表的文人士子的求官之路异常曲折多舛，因此，在他楚辞注疏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其借以抒愤的情感寄托。

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附录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6页。

7)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442页。

## 2.2 科舉制度方面

科举是中国古代取士的重要方式，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到明代时，特别是明中晚期，科举制度已日趋僵化，“八股文”等形式的运用反而成为禁锢士人聪明才智的枷锁，扼杀了其初心与热情。陆时雍髫岁颖异，年少才高，却屡试不第，直到崇祯年间才得以成为“贡生”，并“以贡当得官”。据『嘉兴府志』记载，陆时雍应为“选贡”之士，即各地方学官在正常的岁贡之外，另外考选优秀的生员充贡国子监。陆时雍的才学虽毋庸置疑，但随着明代学校的普及和科举入仕规模的扩大，作为“候补官员”的贡生终究很难真正做官。陆时雍不得不像其他被摒弃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士人那样在读书做官之外，寻求另外的出路——或处馆，或入幕，或从商或成为山人客卿。陆时雍后来馆于京官戴澳之家，就是以此为背景的。

## 2.3 經濟狀況方面

与政治混乱、科举僵化不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经过长期积累，明代中晚期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甚至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在陆时雍的家乡——嘉兴桐乡。据许瑶光『嘉兴府志』记载，“桐乡之地，土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富商大贾，长楫巨舶，夷軿海错，鱼盐米布之属，辐湊成市，居民富饶，市邑繁盛”，“城郭森罗，市廛错列，高门纳驷，甲第连云，红粟流衍，礼乐孔殷”，在当时堪称“江东一都会”“江东之雄郡”。<sup>8)</sup> 社会经济的繁荣，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优渥的生活环境，但却能带来社会风气、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的变化。市井气息变得浓厚，吟风弄月，附庸风雅，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风开始流行。此时，展现世俗人情，代表明代新型文艺<sup>9)</sup>及成就的小说、戏曲颇受大众欢迎。这为明代后期文学

8) 参见许瑶光『嘉兴府志』，清光绪5年（1879）刻本。

9)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1—204页。

理论的自觉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陆时雍的诗学理论及楚辞观即深深植根于此。

## 2.4 學術环境方面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促使人们追求个性解放，进而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并且随着王阳明心学思想大行其道，学人掌握了更为有力的批判武器，“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sup>10)</sup>学者们为破除盛行明朝前期百年之久的台阁体所遗留的弊端，竞相从不同方面提出复古的口号，并形成了前后七子、唐宋派等诸多文学集团。从明初的“前七子”到“公安派”“竟陵派”文学集团上的论争，本身即体现了文学从朝廷到民间的权力下移。同时，这些文学争论也体现了明代的文艺追求在人生价值观上实现了从重群体到重个体、从追求格调到追求情趣的转变<sup>11)</sup>。至明代万历年间，明朝政局日益腐败，党争也日趋激烈。心学思潮因其弊端暴露而逐渐退却，东林中人转而采取折中的方式，调和朱、王两派思想，通过讲求实学的方式，以期实现经世致用、关心社会现实的目的。在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研究屈原及楚辞的学者渐多，赵南星的『离骚经订注』、何乔远的『释骚』、刘永澄的『离骚经纂注』等都是其时的代表作。还有不少『楚辞』集评类著作，如陈深『批点本楚辞集评』、冯梦祯『读本楚辞集评』、来钦之『楚辞述注』等。另外，在关于『楚辞』的文体研究方面、训诂考证方面、图谱方面、戏曲方面等，也有多项著作问世。楚辞学经历了明前期的低谷后，在心学思潮影响下逐渐繁盛，这为陆时雍的『楚辞』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术土壤。在学术传播载体方面，印刷技术的成熟，刺激了商业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据称在当时“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馀金，故刻稿者纷纷矣”，以致“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歿时，必有一篇墓志”<sup>12)</sup>。印刻价格的低廉，为读书人著述出版传播提供了条

10) [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中，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9页。

11) 左东岭：『明诗鉴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

12) 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85页

件<sup>13)</sup>。陆时雍尽管“才秀人微”，但其主要著作在生前业已刊行，且影响较大，这虽与其作品精良、“不失为一部有特色、有价值的著作”<sup>14)</sup>息息相关，但这终究也是时代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明代印刷出版业的兴盛。

### 3. 時代巨變對陸時雍『楚辭』研究的影響

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对陆时雍的创作动机、屈原评价乃至研究方法、作品传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3.1 對創作動机的影響

陆时雍著述『楚辞疏』，既是文学兴趣所在，也有卓尔不群的个性推动，还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陆时雍在『楚辞疏』的介绍中明确表露了自己的著述动机：一是因“私心爱楚”，陆时雍认为由屈原开创的楚辞体，只有宋玉能继其遗风，景差以下皆不能与之并肩，后世“靡风日流”，更达不到“继楚”的标准，但即使如此，“余故叹其寥寥，而取以附之，是则私心之所以爱楚也已”<sup>15)</sup>；二是要“扫诸附会，补益前贤”，他认为前人虽已有丰硕成果，但不免遗秉滞穗，有必要“抉隐通微，使读者了知其意，世无懵衷”，为此不敢自惜其力，起考亭之后，独以『楚辞』还『楚辞』，阐幽显微，间取旧诂，录其瑜，拂其违，合论而分疏之<sup>16)</sup>；三即借以抒愤。就社会环境而言，屈原生逢乱世，当时，楚国国力日衰，外有强敌虎视眈眈，但在位者却不思报国，反为个人利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以致贤者见黜，谗佞在位，百姓背井离

13) 何朝晖：『晚明落第士人的著述出版活动——以梅鼎祚为例』，『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738-747页。

14) 赵遼夫：『陆时雍与〈楚辞疏〉』，『文献』，2002年第3期。

15) [明]陆时雍撰，张学城、薄迎迎点校：『楚辞疏·读楚辞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16) [明]陆时雍撰，张学城、薄迎迎点校：『楚辞疏·楚辞疏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乡，流离失所。而陆时雍生活的年代，同样面临类似的严峻形势：明朝廷内党争无休，为维护自身利益，各方势力不断拉锯，对异己者展开极力打击迫害，许多忠直之士，遭谗被贬，甚至惨死狱中，以致朝纲腐败，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就个人遭遇而言，屈原早年虽深蒙厚宠，颇得倚重，诸臣莫能比肩，但后因奸人谗害，君王不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惨遭放逐，其存君兴国之志再难实现，只能借助文字表达自己对故国的眷念和对君王的关心，冀幸君王醒悟，风俗改换，眼见再无回还可能，屈原怀石自投汨罗而死，屈原死后，楚国国势进一步衰落，数十年后竟为秦所灭，屈原作『楚辞』时，“国之将亡，阴幽愀懔之气上菟而下泄”，其文辞间难免有“和平之失，沿而哀怨。哀怨之极，至于凄沍”，后世“君子读『离骚』而知楚国之将亡也”<sup>17)</sup>；而陆时雍早年怀有壮志且颇有才学，周拱辰称陆时雍“之才之望所称自进于天下者也。经济不愧于菟、叔敖，读古不愧倚相、射父，登高作赋，不愧屈、宋、景、贾诸人。而超绝之识，沉雄之力，不识千古何拟”<sup>18)</sup>，陆时雍自己也认为“鬢眉男子，提三寸不律，终当举大名，佐亲一醕”，但现实生活中却是屡试不第，无人赏识，以致穷困潦倒，“贫至不能轸釜”，直至“崇祯癸酉”（1633）才得以成为贡生。<sup>19)</sup>陆时雍生逢乱世，“才秀人微”，仕途困顿，长期处馆，即便身怀绝世之才，却也无人能识，年少时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社会现状无力改变，内心不免会郁郁不自得，“居常扼腕”，只能将屈原引为异代知音，“读『怀沙』『天问』以自广”，同时，穷愁著书，希望能藏之名山，以待来者。其『楚辞疏』正体现出陆时雍匡扶正义的爱国之心，及对现实的愤懑不平之气<sup>20)</sup>。

17) [明]陆时雍撰，张学城、薄迎迎点校：『楚辞疏·楚辞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18) [明]陆时雍撰，张学城、薄迎迎点校：『楚辞疏·周拱辰叙』，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19) [清]周拱辰著：『圣雨斋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400页。

20) 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 3.2 對屈原評價的影響

对屈原的评价是历代楚辞学者讨论的中心内容之一，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品德方面，有“圣哲”说、“小人”说、“悃狭”说、“忠孝”说等；二是文艺思想方面，围绕屈原“怨君”与否、“怨君”正确与否等论题都有激烈争论。陆时雍在《楚辞疏》中对此都有回应。在屈原个人品德的评价方面，明中晚期学者的楚辞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更为关注其中蕴含的忠君爱国之情，陆时雍亦是如此。如他在评点《九章·惜往日》“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一句时，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子胥以身备吴，屈原以身备楚者也。”<sup>21)</sup>屈原的意思是说，吴王夫差轻信了谗言，逼死伍子胥后忧患降临。屈原对伍子胥是肯定的，“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因为二人的经历相似，都是被小人谗害、进忠无门之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在历史上，伍子胥是离楚投吴的人，而且为报父兄之仇，曾带领吴兵一度攻破郢都，将楚王鞭尸。屈原当然知道这段历史，但他依然把伍子胥视为忠贤之人，就说明他对伍子胥被迫投吴以及报仇尽孝的行为表示理解，而这个理解的前提，就是忠于君、忠于国。伍子胥先为臣于楚国，后为臣于吴国，即使后来以吴伐楚，被谗人陷害后仍死谏明志，不变的一直是忠国之心，屈原对此深有共鸣。陆时雍认为屈原的“忠贤忧国”精神是与伍子胥相同的。他先是引用《诗经·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作解，意即用人者要选拔贤能之人，而贤能之人也都是“干城”忠国的，然后将屈原和伍子胥并列评价，认为都是“以身备国”的忠臣。陆时雍推崇屈原以身备楚、忧国忧民的精神，自然与“悃狭”“不智”“张材”“自孽”“不善作合”等观点针锋相对。晚明士林“狂人”“怪人”风行，郭子章尝论地方学校的秀才云“受书几何，则芥视青紫；稍知搦管，即奴婢屈宋”<sup>22)</sup>，而陆时雍的屈原研究，从思想内容到文学特色，对屈原都是加以肯定的。关于“怨君”方面，陆时雍力主“非怨君说”，认

21) [明]陆时雍撰，张学城、薄迎迎点校：《楚辞疏·读楚辞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22) 见陈宝良《晚明儒家传统模范的崩坏与新典范的重建》，《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

为屈原“专病党人”。

### 3.3 對研究方法的影響

明代中晚期，楚辞学经历了明前期的低谷后，在心学思潮影响下，终于逐渐繁盛起来。关于『楚辞』的文体研究方面、训诂考证方面、图谱方面、戏曲方面等，都有了新发展，在此环境下，陆时雍通过对屈原的选取与疏解、评点来发掘、激活传统文学中符合时代的“真情”。就其『楚辞疏』而言，在注疏时，他善于运用“援经入骚”“援史入骚”“以骚还骚”的方法。自淮南王刘安『诗』『骚』并举，“以诗解骚”的做法渐被后世注家采用，王逸、朱熹等人同时关注“比兴”手法在诗骚中的运用。宋代程颐『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sup>23)</sup>程颐尤其重视“儒者之学”，认为这是“趋道”的必由之路，他把“溺于文章”“牵于训诂”“惑于异端”看作学者之“大弊”。他所划分的儒者之学、训诂之学、文章之学，已近似后来的义理、考据、辞章说，命名不同，内涵相仿。作为深受理学、心学思想浸染的明末学者，陆时雍非常重视科举仕途，对经义训诂和辞章之学也揣摩日深。陆时雍在为群书注疏时，将治经方法全部运用其中，疏通义理、考证名物、铺陈辞章，这在『楚辞疏』中有集中体现。除以治经方法治骚外，陆时雍还直接以儒家经典文本内容疏骚，如在释『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哀众芳之芜秽”一段时，他引『诗经·大雅·瞻卬』“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表达贤人与国家荣损一体的道理；在释“朝吾将济于白水兮”至“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一段时，引『诗经·小雅·苕之华』“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表达自伤焦灼之苦。陆时雍在注疏『楚辞』时，还善于从“史”的角度来解释，善于以“史”的笔法来书写，主要表现为以史书资料解骚、怀史家精神注骚、运史家笔法疏骚。“复楚”是陆时雍的一种情怀，

23) [宋]程颐 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遗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

因此在注疏『楚辞』时力求“尽扫诸附会”，遵循“以『楚辞』还『楚辞』”的思路。

#### 4. 小結

陆时雍所生活的明代中晚期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方面表现出的新特点，如朝廷阁臣宦官内斗，皇权对地方的控制有所松动，江南地区商业繁荣，思想文艺界在“复古”与“浪漫”中交锋，市井生活雅俗共赏、追求个性等，这些因素对陆时雍的楚辞观及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都是促使他付出极大心血疏解『楚辞』的动力。虽然『楚辞疏』面世不数年明朝即告覆亡，但此书特色所在，声响未沉，著成之后即被同时代学者广泛关注，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张凤翼『楚辞合纂』、潘三槐『屈子』、来钦之『楚辞述注』等均有选引。其和周拱辰『离骚草木疏』、黄文焕『楚辞听直』、王夫之『楚辞通释』、钱澄之『屈诂』、李陈玉『楚辞笺注』等著作一起构成了明末清初楚辞研究集群，对后世楚辞学发展影响深远。

[Abstract]

##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id-late M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tudies of Chuci by Lu Shiyong

Wang Xiaoqia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Mid-late Ming Dynasty(1436—1644), in which Lu Shiyong(1591?—1642?)lives, enjoy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al trend. Factors such as the political ecolog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Economic situation, the social form, and academic atmosphereleaveanddeep imprint on LuShiyong.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impose a deep influence on Lu Shiyong’s creative motivation, his evaluation of Qu Yuan(340B.C.—278 B.C.), his research method, and even the dissemination of his works.Lu Shiyong’s studies of Chuci are mainly embodied in his love for the State of Chu (circa 1030–223 BC), his enriching of the studies of Chuci, and the expressing of his emotion. Lu Shiyong’s pays more attention on Qu Yuan’s loyalty to the ruler of the State of Chu and his patriotism encoded in Chuci, in terms of evaluating Qu Yuan’s personal morality. Lu Shiyong is good at researching Chuci via the method of studying the Classics, and makes exegesis to Chuci in reference to the Confucian Analects, and seeks to “make clear of all forced analogies” in terms of the study method of Chuci.

**Key words** : The Mid-late Ming Dynasty, political ecology, Lu Shiyong, exegesis of Chuci, creative motivation, loyalty to the ruler of the State of Chu, the mode of investigating the researcher's inner center

## [参考文献]

### ■传统文献

- [宋]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明]陆时雍撰，张学城、薄迎迎点校，『楚辞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明]谈迁著：『国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中，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清]周拱辰：『圣雨斋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国书店，1987。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 ■近人著述

- 褚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方铭，『楚辞全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何朝晖，『晚明落第士人的著述出版活动——以梅鼎祚为例』，『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2009。  
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57。  
左东岭，『明诗鉴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